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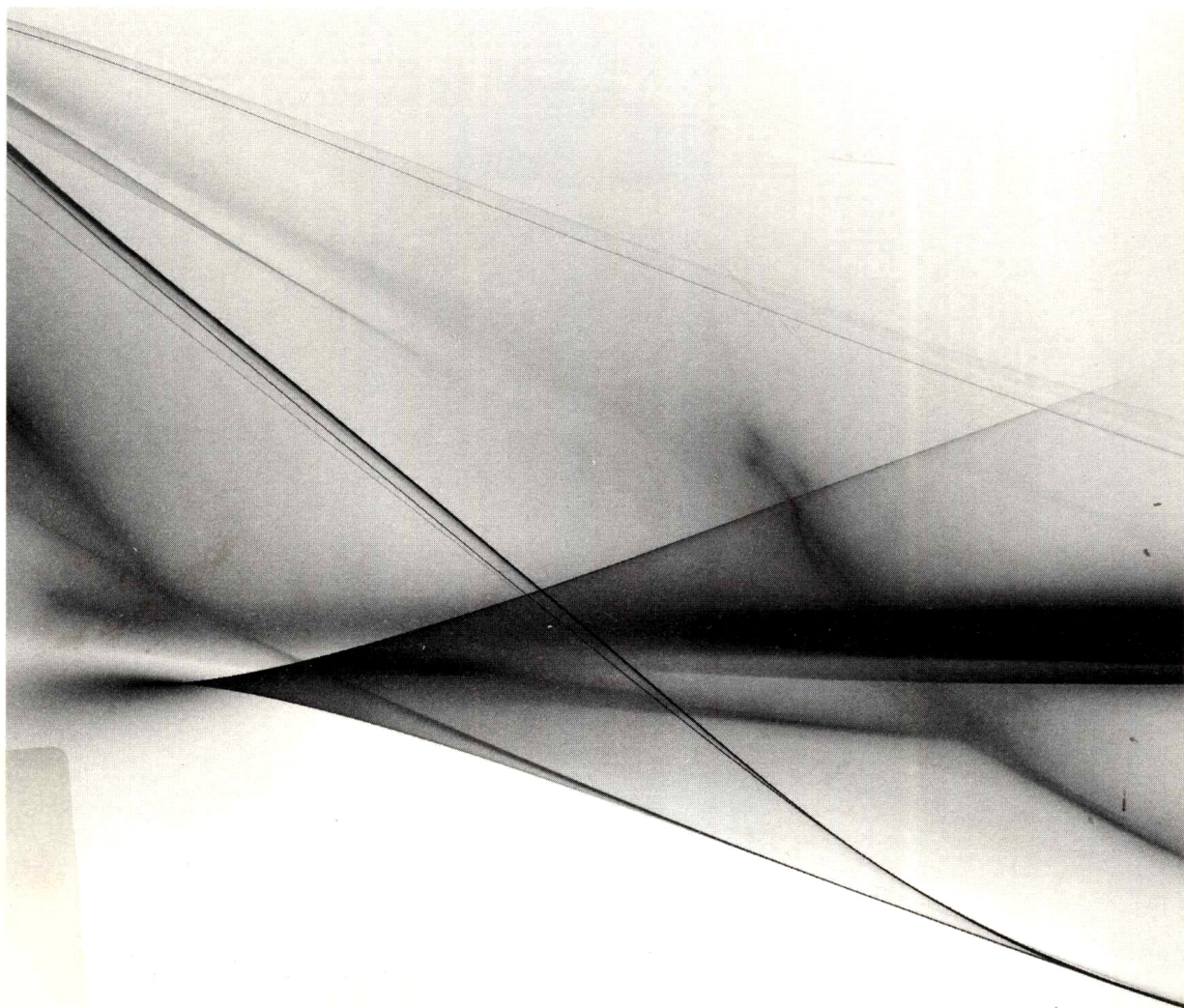
新人文

学理与激情

刘思谦

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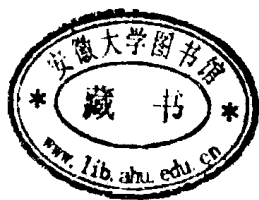
新人文

学理与激情

刘思谦

自选集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理与激情:刘思谦自选集/刘思谦著.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8(新人文)

ISBN 978-7-5649-0940-6

I. ①学…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4592 号

责任编辑 谢景和

责任校对 谢 廓 朱海槟

封面设计 翟森森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4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编辑人语

大学读书时，刘思谦老师就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在《文艺报》写作培训班中所发表的犀利新鲜的文学评论，配合时代的节奏喷薄而出，就像张抗抗当时的大学生题材小说那样，极富激情和感染力。思谦老师当时风头正健，高论迭出，好评如云；每有新作，我们便争相传阅，可谓粉丝如云矣！

真正领益是二十年后在母校河南大学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2005年先为她和郭力、杨珺出版了《女性生命潮汐——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研究》，又出版她领衔主编的《女性生命潮汐——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选读》，果然好评如云；2007年为她策划再版了《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2009年起，以“娜拉言说”命名的书系出版了四本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重镇河南大学之实绩予以彰显。

从当代文学研究转向中国女性文学乃至文化研究，对于刘思谦先生而言，堪称一个成功的转型：她由外在的社会学评述而转向了内在的女性心理乃至文学本身的阐发，由抵抗女性失语所造成的历史断裂而形成了敢说敢言的鲜明个性，不畏惧任何权威的犀利文风……她静心沉潜于女性文本，以其对女性学术思维的深刻理解与个性顿悟，进行细致入微乃至精彩纷呈的解读。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至今仍然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甚至笔下还经常出现百字长句来畅叙己见，思维的敏捷，语言的灵动，评点的精妙，意气的风发都不亚于如今的愤青，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思谦老师身体力行。

如今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她从事文学评论工作30多年的结集。《学理与激情》是多么恰切的表述与概括，给人的感悟是如此丰富，那些耳熟能详的赞誉放在她的身上一点都不过分，宝刀不老，英风不减，甚至有些姜桂之性愈老弥烈之感……台湾高阳先生作品《胡雪岩全传》曾对一位久闯江湖的年迈女杰发出钟情赞誉：英雌！而我当慨然朗声说：思谦先生真吾师也！

不知读者诸君和恩师思谦先生以为然否？

女评论家刘思谦论^{〔1〕}

谢望新

导 言

中年女性评论家在新时期文学中有着确切不移的位置。中年女性评论家为女性作家的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晓立(李子云)和刘思谦是中年女性评论家的两位代表人物。

站在光华灼灼的庞大的女性作家群面前,女性评论家则零落不成军,黯然失色。对“传统批评派”的某些轻率否定,也殃及对女性评论家的公正评判。她们那并不特别耀眼的光芒,似乎全要被遮没了。

然而,并非任何一种舆论都可以改变是非的尺度。那样,舆论岂非万能?“传统批评派”、女性评论家,既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的现实概念。认定“这一代人都已经呈现出共同的‘衰老’趋势”,是否为之过早?在我的心目中,这一代中年批评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分量是沉甸甸的,这种影响将强有力地持续下去。更何况,她们还在充实自己,改造自己,完善自己!

可以纳入“传统批评派”范畴的中年女性评论家,只有五位——李子云(《上海文学》编辑部)、刘思谦(河南大学中文系)、吴宗蕙(《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盛英(《天津文学》编辑部)、陈美兰(武汉大学中文系)。她们或做编辑工作,或执教于高校,是标准的一代中年女性。女性作家之多,女性评论家之少,这个奇异的反差现象,需要专题探讨。我只想借用一句“套话”

〔1〕 此文节选自《谢望新文学评论选》(上)《中年女性评论家论》,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做作家难，做女作家更难；做女作家难，做女评论家更难；做女评论家难，做名女评论家难乎其难。评论家要有比作家更宽广的艺术胸怀，更深厚的知识素养，更锐利的思辨能力，更精确的评判尺度。

可庆幸的是，新时期文学毕竟有了自己的五位女性评论家。而其中李子云和刘思谦的成就，足以与同一代中的许多男性批评家抗衡。她们在新时期的文学中，占据确切不移的位置。她们对女性命运和女性作家创作命运特有的关注，又使她们在这个领域整体的研究水平，超越了男性评论家。仅此，女性评论家与女性作家一样，在男性评论家和男性作家面前，不必有丝毫的卑怯感。她们有理由自信。

社会批评是批评家的一项重要任务。社会批评中包含有审美批评。社会批评的独立地位不可动摇。

某些批评家在论及“传统批评派”的“过失”时，不屑地捧来一顶帽子：“社会批评”！他们则自称为“审美批评”，似乎还是纯粹的“审美批评”。而且，轻易地把任何“社会批评”都推进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深渊。我对这种批评的“轻率”，大不以为然。很难想象，文学批评可以置社会批评于不顾。

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人学。什么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面对艺术形象创造为中心的批评。因之，对于那些特别关注社会进步和人的价值的实现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家给予高贵的礼遇，既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文学批评家的历史责任感之所在。

文学的社会性，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批评，是文学和文学批评最基本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在五位女性评论家中，刘思谦是最早也是自始至终尊重这一命题并孜孜不倦地为之实践的。

她的文学批评，是典型的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批评。而她的批评锋芒所向，首先是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潮。读刘思谦的评论文章，你时时可以感受到她的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中，与极左抗争的不可遏止的激情和力度。她曾引用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的话，来表达她对“反思文学”的歌赞：“这样的作品，可以使那些想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人、那些想继续搞极‘左’路线的人胆寒，使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

奠定刘思谦作为一个评论家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向“人学”攀登——

读刘心武的小说创作》。

在这篇文章中，刘思谦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刘心武创作的发展道路：《班主任》“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复苏的‘潮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呼唤个性开始，迈出了他向‘人学’攀登的第一步”；《如意》和《立体交叉桥》“把具体的人作为自己观察生活、反映生活的出发点”，“标志着刘心武在向‘人学’攀登之路上跨上了一个重要的阶梯”。并由此引申出一个重要的文学结论：

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是通向“人学”高峰的双翼。

在刘思谦的所有理论概括中，这是最引人注目的。

刘思谦以其深邃的穿透目光，看到理想与现实、环境与人之间的距离。她认为文学不仅需要现实主义，也同样需要人道主义，并用人道主义来充实和深化现实主义。

刘思谦的宝贵之处，还在于她从不把自己的思想封闭起来，凝固起来。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她同时在两个方面深化自己的思想。

一方面，她从与当代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作家和作品中汲取理性的力量和生活的激情。她的代表作有：《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张一弓创作论》。

另一方面，她在对当代文学作出历史的宏观的把握上，校正和丰富自己的文学见解。她的代表作有：《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旧梦与新岸的辩证法——关于知青小说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追赶青年的轨迹》、《他们和新中国同命运——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

刘思谦给予作家蒋子龙和蒋子龙创造的“开拓者”家族的形象系列很高的评价，并准确地找到了这二者创造互为因果的关系。她指出：“开拓者的性格，正是和蒋子龙的心灵十分接近而又亲切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倾注了作家自己那开拓者的精神、气质和探求，打上了蒋子龙的感情烙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开拓者。他是以一个开拓者的眼光、激情和气魄来创造开拓者的形象的。”

对张一弓笔下新时期农民形象的创造价值，刘思谦评判的眼力也是十分准确的。“张一弓不愿意用自己的笔去证实鲁迅半个世纪以前对农民弱点的剖析而宁肯寻找农民身上那属于现在和未来的新的思想、新的灵魂、新的人物”。这里表现了张一弓独立支撑的勇气。“即使在那些以沉痛的心情

回顾过去的作品中，他的艺术构思的支点，也牢牢地安放在现实的土壤之中”。

刘思谦选择蒋子龙和张一弓作为自己作家论的写作，决非偶然。蒋子龙和张一弓，是当代文坛站立于时代生活潮流中心的两位重要作家。蒋子龙和张一弓，通过新生活开拓者形象的艺术创造；刘思谦则借助这类形象的理性解剖，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社会观、生活观和历史观。他们执著于中华民族的兴衰和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这点上，心灵是相通的。蒋子龙和张一弓创作的最杰出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变动作出直接的评判，而刘思谦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评判他们创作的成败得失，也就顺理成章了。今天的中国，政治和政策的因素，虽然不是决定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的唯一因素，但刘思谦宁肯相信，政治和政策的因素，对今天中国人的命运的影响还是强劲有力的。刘思谦是清醒的。这种清醒，是历史本身启示的。

因之，当刘思谦试图从纵向和横向，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进行宏观考察和把握时，她的社会批评就变得更为犀利，咄咄逼人。有时，她简直就在大声疾呼，愤怒鞭挞，或拍手称快，热烈颂扬。

《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这也是刘思谦的文学评论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篇文章。她细致地分析和鉴别了十七年中几位代表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以及康濯的《水滴石穿》，孙犁的《铁木前传》，然后果决地亦有说服力地作出三个结论：

一、作家也是现实的、生活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他们很难超脱时代的制约和影响，而且他们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也难以超出一定时代所能够达到的高度。

二、一个作家如果是深入生活之中和群众共同着呼吸而又是善于思索的，如果他使自己的笔听从了生活真实的权威而又是从生活中提炼概括的话，他就会以自己对于生活的某些独特的发现，形象地显示出历史真实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为后人认识和了解这一段历史提供某些真实可信的生活画面。

三、写人，写人的命运、人的性格和人的心灵，是十七年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刘思谦清醒地看到了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尖锐的矛盾现象：“时代的制约和影响”与听从“生活真实的权威”之间的矛盾。

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的愿望是顽强的。作家的出路在哪里？在于突破和超越时代的制约和影响。以客观条件所能够允许和容忍的方式，使历史的真实曲折地、部分地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反映。这就要求作家自己必须具有强健、明朗、独立的意识。对于那些以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创作视野的作家，这个要求显得更为急切，也更具实效。

《旧梦与新岸的辩证法——关于知青小说的回顾与思考》、《文学追赶青年的轨迹》、《他们和新中国同命运——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三篇文章，则直接依据现实生活的同步发展，来探索文学反映当代知青、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的成因及变迁。

社会批评同样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刘思谦、吴宗惠的文学评论，就是一个证明。优秀的、杰出的社会批评，可以唤起读者一种亲切感，产生共鸣，激发他们对生活的再思考和创造的热情。这是作家艺术创造的力量，也是评论家的理性和激情的力量。

社会批评并非必定枯燥无味的，它同样可以具有很崇高的审美价值，很优雅的审美情趣。

首先，社会批评是以艺术分析和艺术鉴赏为基础的。它不是脱离有着无比差异性的文学创作个体和文学现象所作的超然的社会批评。刘思谦关于认识当代，反映当代的文学见解；吴宗惠对女性解放的观念，都是在对文学创造的形象作了细致的分析之后得出的。有的达到了鞭辟入里、情动于衷的美妙境界。

其次，审美的概念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是唯有艺术的审美，形式的审美，心理的审美才是唯一的。社会的审美，甚而思潮的考察，也应包括在审美范畴之内。当评论家透过艺术形象的分析，指出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潮的题旨中的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就具有社会美学价值，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行为产生某种制约或倡导的作用。扬其真善美，去其假恶丑。

再次，构成作家创作个性的因素是综合性的，创作个性的差异，主要是作家审美意识的审美经验的个性差异在创作中的反映。囊括进作家创作视野中的生活素材，及最终改造为艺术真实，起主导作用的，是作家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评论家找出和发现作家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的个性差异，这种个性差异可能是取材的，可能是艺术的，性格和心理的，也可能是人生

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潮方面的。足见题材的现实性和社会历史的价值，不可能被摒弃在审美批评的大门之外。

可以断言，社会批评仍然是长时期内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法。社会批评在文学批评中的独立地位是动摇不了的。

准确鉴别作家的创作个性是批评家极重要的一种能力。扶持和保护作家的创造精神是批评家的神圣职责。坚持批评的独立性和自由是批评家宝贵的人格和文品。

在《关于刘思谦的文学批评》一文中，赫然写着这样的文字：

我注意到在分析一部作品的社会历史内涵时，刘思谦总是自由的、开放的、富于创造性的；一旦进入作家的灵魂世界、进入作品的艺术结构中去，她却往往显得无所适从，目光滞浊。这还不仅是刘思谦一个人的弱点，在阎纲、刘锡诚、张炯等一批中年文艺批评家那里，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个奇特的矛盾。他们的大脑既不灵活，而手中的一支笔也变得枯涩了。他们只能跟在文学家身后，用一种习惯了的思维模式艰难地追逐日益变化着的文学。

同她的思想解剖刀相反，她的艺术解剖刀不仅鲁钝而且锈迹斑斑。

我真为这种武断吃惊！

这里，我愿充当包括刘思谦在内的中年评论家的辩护律师。我要证明：他们的艺术解剖刀非但没有“鲁钝”和“锈迹斑斑”，也决不“一旦进入作家的灵魂世界、进入作品的艺术结构中去”，就“往往显得无所适从，目光滞浊”，而是有很高的艺术鉴别力和鉴赏力。

现在我们要说到刘思谦。

刘思谦的职业是高校教师。她的文学评论，在后来，极少学院气，极少教条八股味。在对创作现象进行艺术解剖和理论概括时，她不时闪射出智慧的火花。责难她“一旦进入作家的灵魂世界、进入作品的艺术结构中去，她却往往显得无所适从，目光滞浊”，是不公正不客观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刘思谦发表过两篇探讨中篇小说情节结构的专论——《谈中篇小说

情节结构形态之演变》、《作为叙事体文学的中篇小说》。

两篇专论将中篇小说情节结构的演变,放在小说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侧重点则放在新时期文学十年中篇小说创作这个实体上。抽象的概括附丽于活生生的创作现象,表现了评论家深厚、良好的艺术感知能力、艺术素养和蓬勃的再创造精神。“由故事化、事件化到生活化、性格化、象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小说艺术空间的扩展和拓深”,这是刘思谦给予新时期小说在情节结构观点上的一个总的论断。评论家还从小说结构内部规律活跃的三个元素——“情节的弹性”、“视点的变换”、“时序的灵活处理”的流动变异,进一步论述中篇小说的“自我调节与超越”,“艺术天地审美空间豁然开朗”的能动性。刘思谦将新时期中篇小说结构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结构形式的变化阶段,出现了双线结构、网状结构、旋转舞台式结构等新的形态;结构空间的变化阶段,出现了通过情节的浓缩来扩大艺术空间和通过情节的淡化来释放艺术表现的能量;以及情节的深层象征——由小说的全部人物、情节描绘所暗示出来的整体的象征意蕴等新的走向。并断言:小说结构目标由情节故事化,向人物性格转移,再向心理结构转移,是一个大的发展脉络,最终将走向交叉和无意向、无定向。

刘思谦的这些研究成果,相信会对创作产生积极的作用。

李子云、刘思谦这一代中年女性评论家,她们出身科班,长期接受了良好的文学熏陶和教养,又长期在高校教授文学,或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她们不仅有着对倾向、思潮的特有的鉴别力,对艺术的感知、参悟、对话、反省,也有相当的功力。她们虽然主要接受的是较正宗的文学教育,但她们一个非常宝贵而可爱的品格,是不保守,不固守陈规,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所长。就她们整个思想、思维和方法的体系而论,她们是开放的,而不是日趋封闭的。因此,她们对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探索和创造,持豁达的、乐观的态度,决不惊慌失措,视若洪水。

在中国当代文坛,王蒙是第一个把眼光投向西方现代派文学而进行艺术探索的。刘思谦也是评论界较早撰文支持王蒙借鉴外国文学之良规来表现我国现实生活的这种大胆的尝试的。现代派文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刘思谦在《生活的波流——读〈布礼〉与〈蝴蝶〉》一文中,则开宗明义指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看作是一个反现实主义的颓废没落的文学流派而全盘否定,没有看到它的合理性内核。”而在当时,评论家作出这种评断,是需要理论和人格的勇气的。刘思谦文章的写法,更在于她始

终如一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于她的理性概括。她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意识流”艺术手法的发展历史,比较王蒙的创作实践,从理论上找出了属于王蒙自己的艺术特征:特别注意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的不可分离的联系,注意人物意识的形象性:人物描写上有意识地控制人物意识活动的自然性、随意性和杂乱性,压缩了意识的感性阶段的内容,增加了意识的理性阶段的内容如思考、概念、判断等。刘思谦所作的这种描绘,可以说为“东方意识流”提供了一个雏形。一些批评刘思谦对王蒙艺术探索肯定的文字,不无嘲弄地认为:“她不过是为王蒙的存在寻找一个合理的立足点而已……批评家无法从她的理论制高点上俯瞰作家,帮助作家,却不得不被动尾随其后,充当一个辩护师的角色。”这是否有点不近情理?

刘思谦提出:要用开放的眼光,宽宏的度量和不拘一格的鉴赏标准,来估价日趋明朗的小说多样化(包括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和审美思维方式及经验)发展态势。这实际上也是涵盖一切艺术探索和创造的标准,是评论家开放性的批评体系的一个宣言。

后来,刘思谦把她同感于文学版图不断扩大而喷涌的激情,集中于一篇《追寻探索者的足迹》的文章中。她对当时在思想和艺术上最富创造性的几个代表作家,一一加上深情描述:刘心武终于获得了一双“文学的眼光”,找到了“人”、“人生”这个“聚焦点”;冯骥才“穿过莽原奔向遥远的目标”,“筑起现实主义的新的阵垒”;蒋子龙“从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小说;陈建功以创作的多元显示出开拓精神;茹志鹃在她原有的委婉与清新中,又增加了深沉和激越,有时候还稍稍有一点悲凉;高晓声独树一帜,佳作联翩而出。等等。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批评世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批评个性。
“传统批评派”在提高自己的现代意识、理论意识和批评的整体意识中走向新的天地。**

在现代社会,全智全能,仍然是属于那极少的人才。大多数人,能在某一两个领域,甚而某一两个方面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作家一般只提供感觉世界、经验世界,优秀的批评家还要提供理性世界、哲学世界。这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境界。因此,我始终认为,理性思维和

哲学探索是对社会、人生和历史的经验的更高概括。

也许,这也可以作为对女性评论家出现稀少的一种解释。

她们的出现,却是妇女意识和女权获得某种自由度的象征,也是女性智慧的一次释放。

然而,她们之间是有差别的。她们各自拥有的批评世界与批评个性,确立了她们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任何男性批评家和作家,可以褒贬她们的得失,但无权对她们的批评地位作出否决。她们之间,谁也不能取代谁,别人——更无从插足。她们面对的,只有一种威胁——自身的禁锢和僵滞。这会促使她们批评生命的枯萎。

现实是,她们仍以超越常人的负荷,在顽强地进取、拼搏。中华民族女性的坚忍性和负载能力,在她们身上得到延续。

女性批评家的批评世界的建立,多与其人生经历、感性经验有关。而男性批评家,一旦拿起批评武器,多用理智来选择其批评世界。

在五位女性评论家中,刘思谦的外在和内在都是独特的。她受过家庭的良好文学熏陶,但她的身世又是不幸的。她也有过曲折而隐秘的情感经历。凡此种种,反倒培植了她的男子汉的雄风。她像许多男性批评家一样,冷峻地审视着整个文学世界。她的个性和气质,使她更为关注文学形象创造中的现实社会和人生。

由女性批评家的人生经历和感情经验选择的批评世界,一经确立,她们各自的批评个性也在悄悄地生长起来。公允地评价,李子云和刘思谦两位,已经大体形成了自己的批评个性体系,吴宗蕙、盛英、陈美兰三位,还只能说具有某些批评的个性特质。

李子云的批评个性体系,概言之:宽容而不尖刻,简约而不芜杂,清纯而不苍白。

刘思谦的批评个性体系,概言之:锋利而有力度,激越而有温情,思辨而有色彩。

李子云崇尚冰心为人作文的境界:“透过那优美而从容的文字,所显示出来的清纯之美——一种没有诅咒、只有祝福的精神境界,始终使我钦慕不已。”友善宽容,是李子云处理女作家、作品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也是她的批评个性体系的一根重要支柱。即便对待作家作品中的某种缺陷乃至失误,她也是取细致鉴别的态度,然后善意地加以修正、补充。可以认为,在批

评界,李子云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颇为出色的。她绝不会让珍珠被污泥掩藏。正因为把握得准确,李子云批评的自信力就显得充足,于是,她在对作家作品下断语时,才如此简约。简约是宏大的李生物。达到简约,决定于批评家宏大精深的文化教养和高尚的品格。芜杂——不只是简约的对立物,它简直就是世俗的产儿。思维和逻辑的清醒,从来是优秀人才必备的品格。喋喋不休,含混不清,语无伦次,是思维和逻辑的失常、错乱。李子云崇尚“全无半点骄(矫)饰与做作”,“自然天成”。“美与自然的统一”的境界,还充分体现在那纯美致远的文字中。她在描绘某种文学形象,或从理性的高度进行概括时,文笔既简洁又优美,给人一种包容丰富的感觉。自然,李子云作为批评家的才智,并没有在最充分的自由度上发挥出来。长期的繁重的编辑工作,移植了她不小的一部分才情。这是可惜的。但于整个文学界,又有某种必要。文学界多一些深明大义、兼收并蓄的编辑,文学的发达就增添了一种巨大的推动力。

与李子云不一样,刘思谦进入文学批评界的初期,起点并不太高。她还没有摆脱作为一个教师的那样的思维轨道和评判方法,更缺少一种对文学批评冲击的勇力,拘谨而又生气不足。她只停留在对作品一般性的注释的水平,偶尔也有灵感的闪光。作为她的文学批评的一个转折关节,是她勇敢地向《文艺报》投了一篇稿,并因此受到关注和厚爱,不久又参加了《文艺报》“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选读书班(我有幸在这个班里结识了刘思谦,这个班后来被我们尊称为“黄埔一期”),刘思谦的文学批评开始了第一次腾飞。她从此显得信心十足,她的批评观念和文学见解也愈来愈有灵气。当她把自己的批评视野转向文学形象创造的现实世界时,她的男性批评的雄风——评判的锋利,思辨的敏捷,就充分展示了出来。而她作为女性批评家特有的另一面——温柔之情,仍时时流露于她的批评见解中。她的文笔具有男性的坚实,也融和着女性的徐婉。她的感情,运行于她的理性思维的轨道上。今日的刘思谦,已经远远舍弃了一个教师的那种古板、凝滞的种种陋习。

坦率地讲,女性评论家的理论意识和批评的整体意识仍嫌薄弱,尤为缺少气魄。注重实证,宏观把握不足;注重微观,量度分析不够;注重个别,比较研究不多。驻足于有血有肉的创作实体,又有作规律性的概括和理论的升华,这样的评论仍然稀罕。

新批评浪潮的冲击,使“传统批评派”面临深化和开拓的迫切课题。理

论意识、整体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加强，“传统批评派”为之豁然开朗，眼前展开了一个辉煌广阔的新天地。

近期，女性评论家不约而同，不期而然地在整体批评中加重理性的成分，增强现代意识观照的能力，也可看做整个现实主义批评的一个新的意向。

在女性评论家中，刘思谦在理论意识和整体意识所作的超越，力度和深度仍要高出一筹。在文风上，她保持了她一贯有的激情洋溢、文笔优美的特点。但她囊括的新时期小说的审美价值的命题，仍然是一些传统的命题，第一个就是“崇高没有泯灭”。不能不使人折服的是，刘思谦面对这些传统的命题，对其合理的部分，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地为之辩护，为之张扬，但又不忘记把它置于现代意识的格局和境界中加以审视。

她热情地呼唤：崇高既没有泯灭，神圣也不会死去。崇高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美的历程同人类进步的道路同样坎坷艰难，但它还是火，还是风，还是河，而是火就会燃烧，是风就会呼啸，是河就会流动。

刘思谦的整体是感情型的。但她的理智又是极其清峻的。她将新时期与以往时期小说的崇高美作了如下比较：

一、文学的崇高不是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的重复，而是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崇高审美价值的重造。美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有旧质的扬弃也有新质的融入。这即是由意识的贫穷愚昧落后而激发出来的变革意识。

二、新时期文学的崇高美，正在摆脱以往的单调和苍白，呈现为不同的层面和形态。即使是最普遍的那种“艰难伟大的美”，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像过去的理想主义为了理想忘了现实，而是理想烛照下的现实。执著的理想和意识的历史感悟强化了作品的批判锋芒和历史意识。

三、新时期小说崇高美在形态上的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悲剧崇高。文学悲剧意识之觉醒，一方面是对过去那种虚妄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乐观主义的反省，另一方面，民族振兴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路上种种变换着脸谱的阻力，从正反两极启迪了作家的忧患意识。

在《小说创作中的悲剧观念》一文中，刘思谦进一步区分了新时期文学之于传统文学的三种新的悲剧体和悲剧观。一种是“独特的英雄悲剧”的出现，刘思谦把它的特征归结为“目标本身的虚妄、荒诞与无价值”，“强权政治造成的人的整体荒谬可悲的生存方式”。另一种是“普通人的生活悲剧”，“其性质是正常中的反常、合理中的不合理、本来不应该发生而发生了、本来

能够解决而没有解决的悲剧”。这种悲剧的美感形态区别英雄悲剧的崇高体,而属于优美(秀美)体。再一种是“受环境制约的性格悲剧”,甚至是“个人的性格力量存在着限度”,“是个人与环境的合力所致,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刘思谦所作的这些理论概括,是以艺术的审美和鉴赏为坚实基础的。她很善于从文学形象和文学现象中找出美学个性和美学特征,并自然地赋予它理想的形式。

不是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刘思谦,怀疑甚至否定一代中年评论家的艺术审美能力吗?刘思谦们,一代中年评论家们,还不至于穷途末路,山穷水尽,他们仍有深厚的活泼的再创造能力。他们并不故步自封,轻狂虚无,武大郎开店;他们面向的,是文学批评观念的现代意识、理论意识和整体意识,他们一定会有新的长进,新的作为!